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in Classic Qin Opera Roles with Flower Faces

Dongxiang Wang

Ningxia Performing Arts Group Qin Opera Theater, Yinchuan, Ningxia, 75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opera genre of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Qin Opera hold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theatrical arts with its powerful and stirring vocal styles and robust, unrestrained performance style. The huafen (dagger face) role is the most visually impactful and characteristically dynamic type in Qin Opera's performance system, embodying a synthesis of singing, acting, and stylized presentation, which forms the core symbol of Qin Opera art. This study takes native classic Qin Opera works such as *The Case of Cai Wenji*, *The Flame-Horse*, and *Beheading Yan Liang* as research subjects, analyzing the artistic shaping mechanisms of huafen characters from four dimensions: role characteristics, stylized language, performance conventions, and cultural symbolism.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ortrayal of huafen characters in Qin Opera is not a mere replication of singular personalities but a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of ethical concepts, aesthetic spirit, and regional cultural psychology. Through stylized forms, conventionalized singing, recitation, acting, and combat, huafen characters achieve the artistic ideal of "expressing the spirit through form and conveying emotion through voice," becoming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Qin Opera's dramatic aesthetics and moral symbolism.

Keywords

Qin Opera; Flower-Face Roles; Character Portrayal; Notation System;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秦腔花脸经典剧目人物塑造研究

王东翔

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 中国·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

秦腔作为中国西北地域戏曲的核心剧种, 以其雄浑激越的唱腔和刚劲豪放的表演风格, 在戏曲艺术中占据独特地位。花脸行当是秦腔表演体系中最具视觉冲击与性格张力的角色类型, 其人物塑造集歌唱、表演、造型于一体, 构成秦腔艺术的核心象征。本文以《铡美案》《火焰驹》《斩颜良》等秦腔本土经典剧目为研究对象, 从行当特征、造型语言、表演程式与文化象征四个维度, 分析花脸人物的艺术塑造机制。研究发现, 秦腔花脸人物塑造并非单一性格再现, 而是伦理观念、审美精神与地域文化心理的综合表达。通过谱式造型、唱念做打的程式化表演以及写意性的形象建构, 花脸人物实现了“以形写神、以声传情”的艺术理想, 成为秦腔戏剧美学与道德象征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秦腔; 花脸行当; 人物塑造; 谱式体系; 审美特征

1 引言

秦腔起源于陕西关中, 自明清以来经久不衰, 是“西北戏曲之魂”。它以“悲壮激越、苍凉高亢”的声腔风格与“粗犷凝练”的表演节奏, 构成独立的艺术体系。花脸行当在秦腔中承担着刚正、忠义、勇烈等典型人格的视觉化与声音化任务, 是体现秦腔“雄浑刚健”地域阳刚审美的核心行当。花脸造型的色彩与线条、唱腔的板式变化、程式动作的节奏控制, 构成了秦腔人物塑造的美学语法。秦腔花脸体系在唱腔结构、谱式逻辑与人物伦理上均自成系统, 其

造型符号和审美原则深受西北民间信仰、社火仪式与地域心理影响。本文立足秦腔自身艺术语境, 分析花脸人物的造型规律与性格生成机制, 以期为秦腔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当代教育转化提供参考。

2 秦腔花脸人物形象的行当特征与分类体系

2.1 行当结构与性格定位

秦腔花脸(净行)承担叙事与象征双重功能, 是塑造正义、智慧与力量形象的重要艺术手段。其内部划分严格遵循秦腔本土规范, 分为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三类: 铜锤花脸以文职刚正角色为核心, 性格庄重、刚正不阿, 代表角色为《铡美案》包拯、《苟家滩》王彦章; 架子花脸以性格复杂的义士、权臣为核心, 兼具刚毅与机变, 代表角色

【作者简介】王东翔(1987-), 男, 中国宁夏银川人, 三级演员, 从事秦腔架子花脸研究。

为《火焰驹》艾谦、《法门寺》刘瑾；武花脸以勇烈猛将为核心，动作激烈、气势恢宏，强调力量美与视觉冲击，代表角色为《斩颜良》颜良、《收关胜》关胜。不同类型的花脸在人物刻画中形成“忠—智—勇”的性格梯度，使秦腔花脸具有鲜明的精神指向与叙事层次。

2.2 谱式特征与造型体系

花脸谱式是秦腔人物性格的视觉符号体系，核心类型包括“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破脸”，其象征语义与造型规范均为秦腔专属：“整脸”以单一纯色为基底，寓意端正威严，如《铡美案》包拯的纯黑整脸（无任何装饰），象征清廉刚正；“三块瓦脸”以额、鼻、颊三部分分色为特征，用于表现内心矛盾的复杂角色；“十字门脸”以纵横纹线交叉为核心，适用于帝王、大将等高位角色，象征威仪与统摄力，如《下河东》呼延赞的黑红十字门脸（黑化脸）；“破脸”以不规则纹线分割面部，用于表现刚烈粗犷的角色，如《斩单童》单雄信的黑破脸。色彩象征体系坚守秦腔本土逻辑：红色主忠义（如《火焰驹》艾谦），黑色主刚正（如包拯），蓝绿色主勇猛无畏（如关胜），白色主奸诈多疑。需特别说明的是，《法门寺》中刘瑾的谱式为红色揉脸，而非白色，以此凸显其角色特质。谱式与色彩的组合形成“形—色—德”的对应关系，完成从视觉造型到性格特质的转译。

2.3 伦理维度与人物品格的象征化

花脸人物体现传统社会对德性人格的理想化建构，包拯的刚正、艾谦的忠诚、颜良的勇猛，皆以“忠义为核”的道德理想为中心。谱式、声腔与程式动作共同形成伦理象征系统：整脸寓中正之德，色彩喻人格之品，声腔显气节之骨。花脸角色的道德张力与审美情感结合，使秦腔不仅是戏剧表演艺术，更是西北地域传统价值秩序的舞台化表达。

3 唱念做打的程式结构与性格呈现机制

3.1 唱腔板式与性格表达

秦腔花脸唱腔以慢板、二六板、带板、垫板、二导板、滚板六大核心板式为基础，不同板式对应不同性格与心理：慢板节奏稳重、音域低缓，用于情绪铺陈与内心独白，如包拯的慢板唱段，凸显沉稳深思；二六板节奏平缓、旋律规整，用于叙事与情感过渡，如艾谦的二六板唱段，展现筹谋决断；带板节奏明快、字多腔少，用于情绪高涨的叙事场景，如颜良的带板唱段，强化情急之势；垫板节奏灵活，旋律简短，用于剧情衔接与情绪铺垫，如花脸角色上场前的过渡唱段；二导板节奏自由，音域高亢，常用于剧情高潮的引出，如武花脸角色冲锋前的二导板唱段；滚板以急促的伴奏配合舒缓的唱腔，用于表现角色内心冲突与情感张力，如《铡美案》包拯面对“亲情与公理”抉择时的滚板唱段。板式组合服务于角色性格：包拯的“慢板+滚板”，强化理性与情感的冲突；艾谦的“二六板与带板”，展现沉稳与果敢的转变，

均贴合秦腔本土角色的性格逻辑。

3.2 念白节奏与心理刻画

秦腔花脸念白以关中方言为基础，分为“韵白”与“夹白”两类：韵白音色浑厚、节奏平缓，多为四字或七字句式，用于文职角色的情感铺陈，如包拯的韵白，低沉顿挫，彰显威严；夹白节奏紧促、语调上扬，多为口语化短句，用于表现决断与冲突，如艾谦的夹白，急促有力，凸显果敢。念白的语流速度、停顿位置直接映射人物心理：包拯的慢节奏韵白，体现冷静与威严；艾谦的断续而急促的语流，映射其矛盾与犹疑。念白的节奏变化与唱腔的起伏互为呼应，构成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张力，使人物心理在声音层面获得可感知的形象化表达。花脸念白强调“气定声圆”，以气韵贯通情绪，以语调控制心理节奏，达成“声随情转、语带义生”的舞台效果，成为秦腔表演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刻画手段。

3.3 动作程式与身体符号化表达

秦腔花脸的“做打”程式以“刚中寓柔、力中有度”为审美核心，通过固定姿态实现性格与心理的象征化表达：“亮相”展示威严定势，如包拯的“定步亮相”；“掀髯”象征沉思决断，如艾谦的“掀髯筹谋”；“按剑”凸显果敢担当，如颜良的“持剑起势”。以具体角色为例：《铡美案》中包拯“慢步掀髯”，动作内敛庄重，象征理智权衡；《火焰驹》中艾谦“持剑沉肩”，动作利落有力，凸显义士担当；《斩颜良》中颜良“挥刀亮相”，动作刚劲迅猛，体现猛将气质。动作程式的节奏与力度服务于行当性格：铜锤花脸动作舒缓稳重，架子花脸动作灵活多变，武花脸动作刚劲迅猛，形成“行当—动作—性格”的本土对应关系。

4 经典剧目中的花脸人物艺术塑造

4.1 《铡美案》中的包拯形象

《铡美案》中的包拯是秦腔铜锤花脸的本土典范，是秦腔正花脸艺术中“忠正之德”的典型呈现。其“黑整脸”谱式以深黑为主色，辅以白色勾边与额心红点，象征清廉、刚正与心明如镜。唱腔以“慢板+滚板”为核心：慢板部分旋律宽厚、节奏平稳，展现断案时的冷静理性；滚板部分以急促伴奏配合舒缓唱腔，凸显“亲情与公理”的内心冲突。表演程式上，“慢步掀髯”体现沉思权衡，“定步亮相”彰显威严定势，“按笏断案”强化刚正决断。包拯的形象超越个体角色，升华为西北民间对正义秩序的集体心理投射，成为秦腔铜锤花脸“忠正之德”的标志性符号。

4.2 《火焰驹》中艾谦形象

《火焰驹》中的艾谦是秦腔架子花脸的核心代表。其谱式为红黑相间的整脸变体，黑底红额的色块组合，既体现深沉谋略，又象征赤诚忠心。唱腔以“二六板起势、带板推进”，节奏由缓转疾，贴合“筹谋救主—情急行动”的剧情脉络，展现沉稳与果敢的双重性格。表演程式以“持剑沉肩”“快步亮相”“掀髯决断”为核心，动作利落有力，

凸显义士的担当精神。艾谦的塑造完全基于秦腔本土剧情，红黑对比的谱式、节奏多变的唱腔、果敢的动作，共同构建了“智而不诈、勇而不莽”的本土义士形象。

4.3 《斩颜良》中颜良形象

《斩颜良》中的颜良是秦腔武花脸的典型代表。其谱式为蓝绿相间的破脸，以强烈的色彩对比与不规则纹线，凸显猛将的勇猛无畏。唱腔以“带板+散板”为主，节奏急促、声腔高亢，贴合战场厮杀的紧张氛围，展现其刚烈的性格特质。表演程式以“挥刀起势”“跨步亮相”“抖髯怒吼”为核心，动作刚劲迅猛、气势恢宏，强化武将的力量感与视觉冲击。颜良的形象集中体现了秦腔武花脸“勇烈豪放”的艺术特质，是本土猛将角色塑造的典范。

5 花脸人物塑造的艺术逻辑与文化意涵

5.1 写意表现与象征叙事的统一

秦腔花脸人物塑造以“形—色—声—势”的合成语法，将本土伦理与情感外化为可识读的符号：谱式的几何分区完成“以形显德”的性格立骨，色彩的本土编码实现“以色示性”的德性标注，板式的节奏变化达成“以声达情”的心理刻画。人物塑造不靠写实细描，而以秦腔专属程式获得超越个体的文化意义，使舞台成为承载本土公共价值的象征性空间。

5.2 地域文化与审美心理的映射

秦腔花脸人物塑造深度植根于陕甘地域文化：黄土地貌的苍茫孕育了谱式的粗线条与强对比色域，关中方言的高亢塑造了唱腔的“烈、峻、厚、刚”，社火仪式的传统为谱式提供了火焰纹、云纹等母题。花脸人物的性格特质（刚直、忠义、果敢）与表演风格（粗犷、凝练），完全契合西北民风的刚健朴实，是地域文化心理的具象化表达。

5.3 道德理想与社会心理的投射

秦腔花脸承担“本土道德建模”功能：忠义、刚直、勇烈等西北核心德目，通过谱式、声腔与动作完成即时可感的价值呈现。包拯的纯黑整脸塑成“法度与公理”的象征，艾谦的红黑谱式呈现“忠义与智谋”的张力，颜良的破脸凸显“勇猛与气节”的精神——这些形象既满足民众对正义秩序的情感诉求，又通过角色的心理挣扎完成本土价值的内化，成为西北社会心理的情绪载体与伦理坐标。

6 结语

秦腔花脸经典剧目的人物塑造，是本土表演技艺与地域文化精神的统一结晶。其行当分类、谱式规范、表演程式均坚守秦腔本土逻辑，剥离了非秦腔元素的干扰。花脸人物的视觉符号与审美体系，既承载着西北地域的忠义、刚正等传统伦理，又反映了黄土地域的精神气质。通过“唱念做打”的综合表达，花脸行当实现了人物性格的象征化与艺术化。面对当代文化语境，秦腔花脸艺术的研究需坚守本土立场，才能为非遗保护、戏曲教育与文化认同建构提供有效路径，让这一西北艺术瑰宝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李晓明.秦腔花脸表演艺术的表现形式[J].新疆艺术(汉文),2021,(03):107-111.
- [2] 胡林焕.浅议秦腔花脸的继承与发展[J].当代戏剧,2011,(02):36-37.
- [3] 温军海.秦腔花脸的艺术特征[J].当代戏剧,2011,(02):38-39+1.
- [4] 尚长荣.秦腔花脸艺术要提高两个品位——在秦腔花脸艺术现状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当代戏剧,2005,(05):10-12.
- [5] 胡林焕.浅谈秦腔“花脸”行当的人物塑造[J].当代戏剧,2005,(02):38-39.